

常连霆 主编

山东抗战口述史

下 册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抗战口述史/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09-09037-7

I. ①山… II. ①常… ②中…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山东省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453 号

山东抗战口述史

常连霆 主编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914

市场部(0531)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108.75

字 数 15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037-7

定 价 360.00 元(上中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抗战初期我两度在山东工作的情况	张友渔 1
营救在狱“政治犯”纪实	王文克 9
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诞生	周乐亭 15
忆天福山起义和“岭上事件”	刘中华 21
我参加四支队的经过	王建青 29
雷神庙战斗纪实	林一山 45
鲁南抗日义勇总队成立后的一次反顽斗争	童陆生 52
回忆同沈鸿烈的一场斗争	周贯五 56
陆房突围	张仁初 68
我当东平县长前后	周持衡 76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潘振武 79
从宁阳县长到六支队参谋长	马继孔 91
回忆第四支队秦启荣七次谈判情况	亓象岑 95
沭河长流	铁瑛 104
冠县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许梦侠 109
忆抗战时期高唐党组织的创建与卫东斗争	韩宁夫 120
回顾抗战初期我在蒙阴的一段工作经历	苏杰 124
忆抗战时期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	成润 128
莒中县的边沿斗争	白炎波 138
坚持新蒙县抗战三年	周星夫 145
与张里元合作抗战	刘少饒 155

抗日战争时期黄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孙执中	159
反击李仙洲部入鲁纪实	黄作军	181
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	王文正	191
鏖战甘草固堆突破日寇“铁壁合围”	曾思玉	195
攻守马鞍山	廖容标	205
鲁西北伪模范县长刘仙洲部的覆灭	赵健民	219
血战沂水城	胡奇才等	239
忆葛庄战斗	孙继先	248
“无人区”升起了炊烟	钱钧	261
魏家堡战斗	徐斌洲	268
三进昆张地区夺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吴忠	278
反击“万仙会” 扩大根据地	刘其人	297
奋战对崮峪纪实	来光祖等	301
血战苏家崮	张玉华等	309
忆山东纵队四旅敌后武工队	罗俊	317
马鞍山战斗与我的一家人	冯毅之	338
二十一天	王林	348
革命的两面政权	崔子明	356
奔袭刘黑七	陈沂	374
敌工战线	王芳	383
鲁南区费滕边实验县减租减息运动的回忆	李青	401
向封建堡垒进攻	袁成隆	407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	司洛路	419
我知道的濮范政民工作队	杨节	428
临沭“双减”及“双减复查”片段	杨德明	446
走向光明	谷凤鸣	453
第一次解放烟台之战	仲曦东	469
攻克利津城	李丕功等	476
解放阳信城	刘贤权	486
驻华丰煤矿的日军投降情况	封振武	491

军民难分一家人	吴岱	496
忆姊妹剧团	张伟强	505
忆《抗战日报》	翟向东	519
忆抗日战争时期茶业峪民兵联防斗争	李念林	526
大摆地雷阵	赵守福	537
沂蒙老爹	庄新民	545
袁家岩麓冬学	杨雷	553
沂蒙深情	白铁华	561
后 记		567

抗战初期我两度在山东工作的情况

张友渔^[1]

抗日战争初期，我曾先后受北方局和长江局的派遣，两度在山东工作。主要任务是做韩复榘、石友三的统战工作，推动他们团结抗战，并通过这一工作，帮助发展我们的革命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将这两度工作的经过，简要回顾如下。

—

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全境；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占领我热河和察哈尔北部；一九三五年占领我河北东部；同年十一月，又指使汉奸发动所谓华北五省的“防共自治运动”，公然要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大量增加，华北危在旦夕，日本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日本的进攻，震动了中国的一切阶级，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了。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开始发生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反蒋联共的人民政府；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同共产党联合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都说明了这一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

日,由北京学生首先发动举行“一二·九”运动,尔后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抗日救国大示威运动,则标志着我国全民族革命正在走向高潮。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纠正了在党内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党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不仅进步势力要抗战,中间势力要抗战,原来的顽固势力也由于危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在发生分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规定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我党采取的这一正确政策,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加迅速地开展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本来同蒋有矛盾,并处在日军直接威胁下的北方地方势力、杂牌军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都要和我党有所联系,特别是在抗日爆发后,蒋介石也被迫表示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们更需要这样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受党的派遣,先到韩复榘那里,后又到石友三部队,进行了统战工作。

二

我到韩复榘那里工作时间不长,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到同年的十二月初,总共只有四个来月的时间。

我自从一九二七年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到抗战爆发,这中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上层文化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我当时是几所大学的教授、报纸主编,主要是做文化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同时也做一些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宋哲元等人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我在华北联络局工作,推动宋哲元抗

战。北平沦陷后，我撤退到天津。八路军开到太原后，北方局通知我去太原。我和许德珩、程希孟等于八月初乘船到了烟台，改乘汽车到潍县，转胶济路到济南。到济南后，我和许德珩、程希孟通过余心清的安排，同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谈了一次话。

余心清是第三集团军的政训处处长，做过冯玉祥的秘书长，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一向反对蒋介石，同我党有联系。当时他在韩复榘下面，是主张联共抗战一派的代表人物，正在推动韩复榘抗战。

一九三五年，我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的时候，余心清从山东来太原，代表韩复榘同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抗日问题，曾同我交换过意见。一九三六年，我在北平搞华北救国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又接触过。华北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德珩、张申府、杨秀峰、黄松龄、程希孟、刘清扬和我。当时徐冰同志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该会实际上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接受我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活动。彭真同志曾代表北方局指导过我们的工作。余心清这时曾作为韩复榘的代表来北平活动。他主要是来找宋哲元商讨抗日自保问题，同时也来同华北救国会联系。韩复榘所以要积极活动是为形势所迫。当时日本节节进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华北这几个地方实力派已直接暴露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他们与蒋介石不同，学蒋介石他们学不起，已经无路可退。投降，人民不答应；抗战，又自认为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我们党提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口号，所以韩复榘才派主张联共抗战的余心清为代表，到华北各地活动。他估计到华北救国会可能同共产党有联系，想通过它取得我党的支持。

这对我们来说，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便热情地接待了余心清。我们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各自带着家属，在东单三条的俄国菜馆，请余心清吃饭。席间，我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向他谈了我们对形势的看法。余心清在北平大约呆了两三个星期，我和他接头两三次。

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这次路过济南时，余心清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许德珩和程希孟同韩复榘谈话。我给韩

复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两国的国情，抗战的办法、前途等等。据事后余心清讲，韩复榘赞成我们的讲话，认为有道理，有办法，不像别人只讲“空话”、“放大炮”。余心清还说，他已经向韩复榘推荐了我，希望我留下帮助“韩主席共筹抗日大计”。当时像韩复榘、阎锡山这些地方实力派，对共产党又佩服又害怕。大敌当前，形势危急，他们想跟共产党学两手，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可又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对他们不利。所以，不愿意同共产党直接地多联系，更不敢用共产党员做干部，而想通过一些与共产党来往的社会知名人士，同共产党保持一些联系，从共产党方面学点东西，得到一些帮助。他们把我当成是这种人。许、程二位不愿意留下，要去南京。韩复榘也没强留，他们就走了。我答应回太原老家看一看再回来。我到太原，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在济南同韩复榘接触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召集华北联络局的南汉宸、王士英、阮慕韩和我开了会，决定王士英留山西，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南汉宸参加“山西总动员委员会”，担负领导工作；阮慕韩去张家口做刘汝明部队的工作。也就是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山东联络局，由我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我回到山东后，就住在余心清家里，以左翼教授的身份公开活动。这次与我同行的还有梁寒冰、聂元素、韩幽桐三同志。梁寒冰住在律师贾潜同志家里，负责联络、情报之类的工作。同时，党中央还派张经武同志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来山东同韩复榘秘密联系，住在韩复榘的亲信刘熙众家里。我同他配合进行对韩复榘的争取工作。当时，山东地下党省委书记是黎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经常会面，安排工作。分别以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身份与方式，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山东的工作。

这段时间不长，我们主要工作是办了个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由余心清建议韩复榘办的。训练拟派往山东各地区、各部队做政治、军事、民运工作的干部。韩复榘挂主任的名义，实际上是副主任余心清主持一切，训练班的实际教育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教育长是黄松龄同志，黄的助手是齐燕铭同志，主要教员就是我们这几个。我讲日本问题，主要宣传抗日。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陕北抗大的教课内

容。因此，这个训练班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不少。它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革命人才，在推动韩复榘的部队和地方政府联共抗战，并发展我党在山东的力量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另一项工作，是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当时平津失守，平津文化界的一些人士纷纷来到山东。山东文化界这时存在着三种力量，除平津来的这些人外，还有原在山东的两派。一派以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为代表，一派以乡村建设派梁漱溟为代表。为了促进团结这三种力量共同抗战，我们都与之保持联系，经常通过召集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一工作，具体多由于毅夫、张郁光和齐燕铭等同志去做。再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平津失守后，大批学生南下，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团结好、教育好、运用好这支力量，可以在社会上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党领导下，以民先队为中心，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平津流亡学生会”，对联系团结、教育流亡青年，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政治干部训练中，流亡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学生以后分配到山东各个地区工作都被拒绝，只有一支派到聊城范筑先将军部政训处的二百多人，在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同范筑先亲密合作，创造了抗日游击部队，重建了抗日政权，建立了华北敌后著名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训练班，在山东敌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其中很多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骨干力量。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去北方局做了一次汇报。北方局已经转移到临汾乡下。这时日军已先后占领上海、太原等地，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我们估计韩复榘可能顶不住，山东形势将发生变化。北方局当即决定撤销山东联络局，成立豫鲁联络局，设于开封，改归长江局领导，让我任豫鲁联络局书记。我回到济南不几天，韩复榘就决定撤退。余心清把政治干部训练班带到曹县后解散了。训练班的干部和尚未派出的学员，有的去了延安，其余分别去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程潜的第一战区、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和鲁西北范筑先将军部，如齐燕铭同志就是特由中共豫鲁联络局派到聊城的。

抗日战争初期，是一个政局急剧变动的时期，我们必须抓住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对于尽可能地延缓敌人的进展,对于分化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争取韩复榘的工作,虽然没有能够阻止他放弃山东,但对于发展山东革命势力,建立山东革命根据地,还是有所帮助的。

三

从济南撤出后,一九三八年初,我到了开封,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准备组织豫鲁联络局。我同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道去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并请示豫鲁联络局的方针和任务。先见到周恩来同志。他跟我谈话后,由叶剑英同志召集会议,讨论豫鲁联络局的方针、任务,以及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参加会议的有李克农、彭雪枫,张经武等同志。长江局机要秘书童小鹏同志把密电码亲自交给了我,让我通过驻在竹沟(在豫南确山县境内——编者)的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长江局委员彭雪枫同志经常联系。会后不久,彭即去竹沟。为了我工作的方便,周恩来同志让申伯纯同志写信,把我介绍给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由李世璋聘请我当了第一战区政治部的设计委员。我通过李世璋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谈过话,做他们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彭雪枫同志通知我,长江局决定我去石友三部队工作,并交代了方针、任务。我就把豫鲁联络局的工作交由副书记刘贯一负责,提个小箱,离开了开封。由洛阳渡过黄河,到内黄县石友三部队驻地。不久,又随军南渡黄河,东经徐州,进入山东敌后沂蒙山区。

关于我在石友三部进驻沂蒙山区前后的主要工作情况,在《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一文中有过介绍(见《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四年第二期),这里不再重复。此外,这期间曾有过两次很危险的事情。一次是石友三部队第三团团长方大可向石友三报告,说我们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派人瓦解他的部队。石友三很恼火,以为我主张同我党合作是欺骗他,帮助共产党瓦解他的部队,要杀我,在我门口

放了岗。我们派在石友三那里做秘书工作的党员孙湘同志通知了我，劝我离开。我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支队不会做这样的事。石友三既然事先有布置，戒备一定相当严密，要跑是不大好跑的。而且一跑，反而证明我心里有鬼，对团结抗战会更加不利，情况将会更加恶化。我坦然自若，观察事态变化。果然，石友三派传令兵来“请”我了。一见面，他就声色俱厉地把文大可报告的事告诉了我，质问我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我镇静地对他说：“如果确实有这么回事，四支队不该这么做。可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判，要他们处分瓦解军队的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石友三见我讲得很坦率，有道理，态度缓和了些，便派人去请四支队的代表来谈。四支队派孙陶林同志作代表来谈，他声明四支队绝不这样做的事，要文大可把“瓦解”他的部队的人送到石友三军部来审讯，如确有其事，石友三可按军法处理，也可以交四支队处理。文大可没有送人来，说已经逃走了。石友三大概也发现是捏造的了，就不追究了。

还有一次，政治部派在沂水县政府当秘书主任的张健同志，给我们第四支队做了几千套棉衣。县长刘达人不同意，到军部向石友三告了状。当天晚上，石友三找我去开会，参加的有参谋长王清瀚和刘达人。刘攻击张健是帮助共产党，损害了石友三的利益。我反驳了他。我说，根据双方合作抗战的协定，地方政府给四支队做些棉衣是应当的。双方争论得很激烈，我拍了桌子，经参谋长王清瀚调解，才有所缓和。石友三当场没有表态。我回到宿舍，半夜里，石友三又派人来“请”我。我的警卫员说，石友三不怀好意，劝我不要去。石友三的反复无常是有名的，他经常这么干。他同张学良合作时，张学良曾派张云夷给他做秘书长，后来石友三决定反张学良，就在一个半夜里，把张云夷给枪毙了。我说：“杀也得去，不去不能解决问题。”去后，他请我喝酒，边喝边谈。他想把我灌醉，套出我的话来，弄清楚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平时不喝酒，但不知什么原因，酒量很大，在宴会等场合，喝多少也从来不醉。我同他讲来讲去，还是讲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这些道理，并且明确表示，这是我的一贯主张，我认为他赞成这种主张，所以来帮助他，作为沟通他和共产党的关系的桥梁。如果他不赞成我，我

可以离开。结果，他没有套出我是共产党来，又让我回来了。

后来，蒋介石见石友三同我们合作的好，便从中挑拨。石友三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疏远了。我们估计他迟早要同我们决裂，便于一九三九年春撤出。我们对石友三的工作，虽然没有完成最后的任务，但还是有一定成绩的，对我山东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注释

- [1]张友渔，1898年生，山西灵石人。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离北平到济南、开封等地工作，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华商报》总主笔、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营救在狱“政治犯”纪实

王文克^[1]

1937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晚上，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在济南经七路迤南的市区边缘，当时只有我和妻子住的一所独院，非常寂静。突然有人敲门，事出意外，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因我是这年6月刚从北平返济的。“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云集济南，一扫在白色恐怖之下的窒息气氛，济南的抗日空气高涨起来。约在7、8月之间，我利用一个群众集会的场合，发起成立了“山东全省救亡促进会”，由我主持，借用了普利门外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公开挂出牌子，进行抗日活动，记者常来采访。有一天广饶县同乡办的一个小报记者（报社背景不详，记者也素不相识，社址在商埠，报名已忘，登过“救亡促进会”的消息）向我透露：“韩复榘的军法处在打听你。”是同乡之谊的关照，还是其他？用意何在，不甚了解，也不便多问。我只好故作镇静：“这好说，我随请随到。”也使这位不明来历的记者摸不着头脑。晚上有人来敲门，自然首先想到是不是来抓人的，先作逃跑的打算。当时这所院子的后面是农田，直达郊区，可以翻墙逃走。我们轻轻地走到院子里观察动静，查明究竟。不明情况，贸然出走，反而不好。听到再三敲门，轻拍慢敲并不急促，也没有说话声和脚步声，似乎只有一个人。妻子即去开门。她先从门缝里问：“找谁？”“我找郭秋涵！”声音不大，来人这样回答。问：“你是谁？”“鲁宝璐叫我来的。”鲁宝璐是我妻子女师的同学，郭是地下党员，鲁是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鲁到我家

来过，她哥哥鲁宝琪是山东的地下党员，同我有过几次接触。估计有情况或有事来找，当即下定决心，叫妻子开门，我则躲在暗处。大门开了，果然只是一个人，情况有些缓和了。来人问：“你是郭秋涵吗？”关上大门，我妻子回说：“是！”马上把他让到屋里，我也跟着进去。大家不认识，只见他黑黑的脸膛，下巴略尖，有些消瘦，个子不高，穿布制服，大约有二十四五岁，沉着冷静。待坐定之后，他说：“我是来找王会凯同志的。”我说：“我就是。”“请问贵姓？有什么事？”他说：“我叫××（名字已忘记），刚出监狱，省委叫我来找你办一件事。”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是应该理发了。他继续说：“日寇已逼近山东，怕韩复榘撤退时害我们在狱的同志，省委打算发出一份在狱同志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向社会公布；同时发动各监狱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里应外合，逼韩复榘释放，不敢杀人。”他递给我一份东西，题目是在狱政治犯呼吁书，只几百字，大致是国难当头，山东危急，要求释放到前线杀敌。落款是在狱政治犯 420 余人（或许 240 多人），不具名。他还说：“省委的意思是请你设法在大报上登出，一登出来，就发动各监狱同志进行绝食斗争，越快越好。”态度恳切。

当时我想，省委对我估计过高了，我初回山东，社会关系简单，尤其是山东的两大报纸，一是省政府的（可能《民国日报》），一是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名记不得），都是反革命当局的御用报纸，一个人也不认识，实在是个大难题。也许省委以为“山东全省救亡促进会”是当时一个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抗日团体（当然“平津流亡同学会”除外），群众很多，或许有什么办法。其实不然，尤其是这样的东西是难以登在官方的报纸上的。不过，这是省委交办的要事，又涉及到几百同志的生命安全，其中就有我过去的中学同学，也很着急。当时年轻气盛，还是冒然答应下来：“让我想想看。”这位同志告辞时说就回泰安，做秘密工作，姓名会是假的，行踪也不暴露，不再多问。

这一夜我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解不开这道难题。后来，忽然想起一个人，能否利用他办这件事？不过没有把握，也靠不住，有些冒险。革命就得冒风险，必要时闯一闯，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此人就是何冰如，他是《中央日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和《盖世报》的特派

记者，自己又开办了一个“冰如通讯社”，在纬一路，有几十人。他还是“青帮”，在济南颇有点声望，我早已注意到了。此人我是怎么认识的呢？他原是我长兄的大学同学，四五年前参加我长兄的婚礼时见过他，以后即无来往。记者消息灵通，“山东全省救亡促进会”，他不会不注意。可否利用这点微弱的社会关系去找他想办法。这是一个设想。不过此人并不进步，还要见机行事，不能不加戒备。左思右想，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何对付。力争谈成，怎么谈法。谈不成，如何收场。进可攻，退可守，须作两手准备。去时先不交底，假如无望，就借口为“救亡促进会”募捐，慰劳前方抗敌战士和派遣救护队。而且，钱少了不要，不是祈求施舍；钱多了不会给，他倒欠爱国之情，不光彩，以便收场。一旦交底，必须促他办到。不办也不能泄露，以保安全。据得到的情报，当时韩复榘两面受敌（蒋介石和日寇），正同日寇秘密谈判，企图保存实力，妥协投降，继续实行白色恐怖，不能掉以轻心。

二

事不宜迟。第二天晚上，我即去找何冰如。从门房问明了何的房间，径直登楼而上。何的社长室有三四十平方米，一头是大写字台，一头是整套沙发，气派不小，在那时已是很阔气的了。此人三十开外，仍是当年那样胖胖的方脸。见到何，我便说：“冰如兄，久违了！特来拜访。还记得我吗？”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愣了一下，随即客气地应酬道：“记得，记得，哪能忘记？老弟，请坐，请坐！”除随年龄增长更加老练之外，我的样子没有变，他会认出来的。或许那次群众集会他也在场？我们便在沙发中落座。

何说：“有几年不见了吧？听说你在北平。伯源兄（我的大哥）在上海，也有几年不见了，还好吗？”我说：“多谢！他很好，我们也有几年不见了。老兄，这几年你发福了，恭贺，恭贺！”先用募捐的收场想垫个底。何回答：“哪里，哪里！混日子罢了。”这样寒暄几句之后，略谈家常。我尚未说明来意，停了一下，思索如何谈正题，他倒先心急了。说：“老弟此来，有何见教？”此人社会经验丰富，我突然造访，他心中嘀